



河南省  
报纸新闻  
名专栏

核心提示

王泽林,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刘店乡大王庄村一名普通农民,靠种田被评为全国劳模。他从2000年开始兴办孤儿院,先后收养资助了48名孤儿,使这些辍学的孩子重新回到了学校。今年,他收养的孤儿中,又有10人被北大、武大、郑大等院校录取,至此,这所孤儿院里已经走出了27名大学生。9月1日上午,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接见了王泽林和得到他资助刚刚考上大学的10名学生。9年来,一直戴着“体制非法”帽子的孤儿院,曾经几度几乎“解散”,如今,孤儿院已得到了越来越多热心人的帮助和政府的支持,经济在逐步好转,而体制上也即将“转正”。

晚报记者 袁帅 文/图



王泽林说,孩子们只要能实实在在做人,多为他人着想就行了。

# 河南农民九年救孤路越走越宽

“每年都有人考上大学,你说我能不高兴吗,再苦再累我都愿意”

9月17日傍晚,丝雨霏霏。

王泽林站在他的“泽林孤儿院”门口,看着嬉戏玩耍的几个小男孩,满脸笑意,眼神中充满了慈祥。

其实,最近一个多月,王泽林都被幸福包围着,笑容每天都挂在他脸上。

2009年,在王泽林收养的孤儿中,又有10人考取了全国重点大学。其中,张斌考取了北京大学,李根强考取了武汉大学,谭鹏飞考取了华东政法大学,张哲考取了西南大学,王培培考取了郑州大学。

在此之前,2003年,贺鹏举考取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;2004年,郭义飞以690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,石奇珍考取了厦门大学,李志强考取了南开大学;2005年,李盼盼考取了厦门大学,李俊霞考取了东南大学,张怀相考取了武汉大学。

至此,王泽林收养的48名孤儿中,已经有27人

“孩子那可怜的样子,谁看了都心疼,我要是不管他们,可能真的没人管了”

王泽林今年62岁,在孤儿院里,大部分孩子称他为“爷爷”,也有称他为“伯伯”的。

他的孤儿院创办于2000年,位于虞城县至亳州公路小侯乡境内的公路东侧。

“办孤儿院,还得从2000年说起。”王泽林深吸了一口烟,告诉记者,2000年6月,他从当地媒体得知,商丘市睢阳区的李艳华、李兵权姐弟俩由于家庭出现变故,失去了父母,面临着辍学。当时,李艳华11岁,她弟弟李兵权才7岁,经和两个孩子的爷爷协商后,王泽林领他们姐弟俩到家中抚养,并送他们上学。

王泽林收养孤儿的事传出去后,一些失去双亲的孩子不断在亲属的带领下上门,孩子渐渐多了起来。

直到2001年春天,看到家里“实在住不下

“上不了大学,我也不怪他们,只要他们能实实在在做人,多为人着想就行了”

王泽林有时也会感觉到累,累时,他习惯点一支烟,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不出来。

虞城当地人对王泽林的称呼是“王善人”,从孤儿院到老家大王庄,10多里路程,一路上遇见的人常常掏出一支烟递给他,这在农村是一种表达敬意的惯用方式。

王泽林告诉记者,有一年夏天,他带着一个孤儿到郑州参加会议。由于不熟悉郑州地形,散会后两人拖着行李“奢侈”地打出租车到火车站。下车时,出租车司机死活不要王泽林的钱,司机指了指孤儿衣服上印的“泽林孤儿院”几个字说:“你是好

考上大学,孤儿所住的房间里,墙上贴满了奖状。

“每一年都有人考上大学,并且一年比一年多,你说我能不高兴吗,再苦再累我都愿意,这也是孩子们对我最好的回报。”王泽林说。

除了孩子们考上大学,还有一件“大事”让王泽林兴奋不已。

9月1日上午,王泽林和那10个刚刚考上大学的孩子,受到了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的邀请。在河南省委常委会议室内,徐光春亲切接见了他们,强调要学习王泽林同志,大力弘扬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,持之以恒扎扎实实地做好扶贫济困工作,并希望受到资助的孩子们更加努力学习、更加努力成才、更加努力奉献,报答党和政府的关心,报答各界人士的关爱。

“徐书记的接见,是对我最好的肯定,使我深受鼓舞,我一定会把孩子们照顾好。”说这话时,王泽林眼神坚定。

了”,王泽林决心办一个孤儿院。两个月后,一个5间房的孤儿院建了起来。

接收孤儿之初的那几年,国家对农村学生还没有实行“两免一补”。在收了10个孩子的时候,学杂费、生活费开始让王泽林感觉到了压力。

他几次在夜里下决心:再来孩子,绝不能收了。可当一些孤儿找到孤儿院,哭着,甚至跪着向他诉说不幸时,他的心又软了……

“孩子那可怜的样子,谁看了都心疼,我要是不管他们,可能真的就没人管了。”几年来,王泽林一直都是这样说服自己。

就这样,王泽林收养的孤儿越来越多,至今已有48人。其中大多数来自虞城县的各个乡镇,也有虞城以外、商丘以外的。

除了这些孤儿,王泽林还收留了7位孤寡老人。

人,我不能要你的钱。”

说话间,王泽林的眼眶有点湿润,他扭过头用衣袖擦了擦。

对于别人和社会给他的一切,他很感激,他认为,这些都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的肯定。

2003年,孤儿院里第一次有孩子考上大学,他激动地跳起来。王泽林把考上大学的孩子照片制作成展板,激励其他还在上学的孤儿。“如果实在上不了大学,我也不怪他们,只要他们能实实在在做人,多为人着想就行了。”他说自己对孩子们要求也不是太高,只要能做一个好人就行。

“我不能给儿子钱,我的儿子再没钱,也比孤儿强”

“那么多孩子,每天要伺候他们吃喝,家里的粮食也不够吃;钱也花得很快,跟流水似的。当初我不太乐意,办孤儿院,是他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。”王泽林的妻子袁献芝说。

袁献芝告诉记者,有段时间经济困难,一到开学,王泽林就为孩子们学费发愁,一个劲儿地吸烟,很少说话。

为了省钱,他去4公里外的县城办事,从不乘车,而是骑自行车;他也从来不在县城吃饭,再晚也要回家吃。王泽林说,一天就算省两毛钱,时间长了也能省下一大笔钱。

看到王泽林如此省吃俭用地办孤儿院,袁献芝一开始不明白丈夫到底为了啥。后来看到孩子在眼前一天天长,有的还考上了大学,看到王泽林的劲头一天比一天大,袁献芝逐渐接受了他的举动,“现在,我心里也想开了。”

王泽林一共有4个孩子,其中,唯一的儿子从来就不搭理办慈善事业的父亲。前几年,从一家工厂里下岗的儿子想问父亲要点钱,但被父亲拒绝了。从此以后,他就

“只要还有孤儿向我求助,我就会一直做下去”

王泽林靠承包土地、种植速生杨、培育棉花种、开办工厂挣钱,用这些劳动收入办孤儿院。有时候,孤儿院也会得到一些社会援助。

2003年和2004年是孤儿院最困难的时期,当时,孤儿院有4个孩子在上学,15个读初中、高中,再加上几名大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,一年下来需要十几万才能维持。

“孩子们都是长身体的时候,吃得多,我不敢保证孩子们吃好,但必须让他们吃饱。”王泽林对钱控制得很严,“学费、理发、洗澡、生病、吃油、买盐、文具都需要钱,能省一个是。”

“当时,我每天都在咬牙坚持,家里能卖的东西全卖了,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孩子们。”王泽林说,不管再怎么困难,他从来不会主动向政府求助,“徐书记接见我时,问我有没有困难,我说没有,这个孤儿院是我自愿干的,没有人逼我这样做,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,我都会想办法解决,别人愿意帮助,我非常感谢,但不能主动向别人要。”王泽林的语气非常坚定。

走上了外出打工的路。

“我不能给他钱,如果把钱给他了,这些没有爹妈的孤儿咋办?我的儿子再没有钱,也比孤儿强。”王泽林说,儿子不理解他,但他理解儿子,“我的一个孙女有小儿麻痹症,我的外孙有两个得这病的,他们都需要钱,但是没有钱也比没有亲人强。”

从2002年开始,王泽林就陆续在孤儿院四周种树,几年下来,600多棵白杨大多都已成材。这些树是王泽林的希望,他希望用这些树还债。“我欠3个女儿太多,我希望死后把这些树留下来,用卖树的钱来补偿她们。”王泽林说。

为了节省开支,自从孤儿院开办以来,王泽林没有雇请过人,9年来,一直是由妻子和两个女儿跟随他打理孤儿院。从做饭到照顾小孩,两个女儿没有丝毫怨言,最小的女儿在郑州工作,每月还给他寄回1000元钱。

“她们都理解我,不过,我年纪越大却越感觉对不住她们。”王泽林感慨地说。

与几年前相比,如今,孤儿院的经济困境正在逐步好转。

“两免一补”后,孩子们的书费、学杂费全免了,初中住校的孩子还能领到一天1元钱的生活补助,让王泽林的负担减轻了很多。

今年年初,王泽林又开办了毛毡厂和小磨香油厂,目前,运转良好。

“现在的生活我很满足。”王泽林说,几年前,他骑的是破旧不堪的自行车,现在骑的是电动车,原来吸的是每包0.8元的黄河牌香烟,现在吸的是2.3元的红旗渠。

在经济状况好转的同时,9年来,一直戴着“体制非法”帽子的孤儿院也即将得到“转正”。目前,虞城县民政部门正在给孤儿院办理相关手续,孤儿院也将更名为“刘店乡泽林福利院”。“我估计手续很快就会办下来。”王泽林说。

“只要还有孤儿向我求助,我就会一直做下去。”王泽林说,按照他的设想,再过几年,会把孤儿院完全交给两个女儿打理。